



《最後的知識分子》

終將消逝亦或再起？



最後的知識分子

羅素·雅各比著；傅達德譯
左岸文化/9809/320頁
21公分/320元/平裝
ISBN 9789866723254/546

王乾任 ◎ 文字工作者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歐美等國的知識分子，扮演著「啓蒙」大眾和社會「前鋒」的角色。以美國為例，知識分子們以在野之姿辦雜誌、出書、寫文章或公

開演講，對公眾發表意見。

知識分子的言論必須能夠直指問題，提出有益的見解、評論，且須接受公眾檢驗，時日一久，多半能成一家之言，對社會輿論的形成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不少人並無固定工作（雖也有部分棲身學院），靠著寫作演講維生。

Irving Howe、Daniel Bell、John Kenneth Galbraith、Edmund Wilson、Lewis Mumford、Jane Jacobs、C. Wright Mills、Alfred Kazin，都是曾經主宰美國文化圈與社會輿論的公共型知識分子。

然而，1960年代以後，隨著這批公共型知識分子老邁、凋零，卻是後繼無人。

羅素·雅各比發現此怪現象後，致力於分析美國知識分子界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怎麼會從名家輩出轉變為悄然無聲？為何再沒有人能承接這批公共型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最後的知識分子》就是雅各比此追問的研究成果。

雅各比發現，早期的知識分子組成了波希米亞群體，生活在都市的邊緣，穿梭於城市中的藝文團體，不仰賴特定組織供養，沒有正式的一份職工，不上電視廣播，只在報刊雜誌上撰文，寫作的對象是有教養的社會大眾，這些知識分子關心公眾議題，甘於忍受貧窮與不穩定的生活，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局外人，永遠的反對者，不慕名利，秉直而書。當時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沒有遭受控制，總能暢所欲言，以教化社會，以提醒時弊。

然而，不知曾幾何時，這些追求獨立靈魂的波希米亞精神衰退了，能提供給知識分子撰寫文章的報章媒介平臺也萎縮了，趁勢而起的，是大量的學院教職，學院提供優渥的薪資、穩定的工作，還有不少福利（例如寒暑假），逐步收編獨立知識分子。

進入學院之後的知識分子，開始寫起社會大眾看不懂的艱澀學術論文，舉辦研討會彼此酬賀，彼此評鑑、吹捧，學院自成一個封閉的小團體。在學術圈裡，人們學著如何贏得終身教職，拿到大筆的研究預算，發表讓人驚嘆的學術論文，不再關心社會議題，不再對社會大眾寫

作。學院之外的世界，則徹底被商業化，一切唯利是圖。

此外，居住型態的改變，人們從都市往住宅郊區遷移，原本知識階層能夠在都市中輕鬆自由的交往，如今被住宅郊區的優渥生活給隔絕。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必須仰賴汽車與公路，不能再隨意地於大街小巷邂逅。遠離都市中心，似乎也連帶遠離了社會問題的核心。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敏感度越來越低，甚至漠不關心。面向社會的公共型知識分子消失了，原本應該批判社會問題的那些知識分子組成了新左派，新左派則進入了學院，遠離了社會。

離開了都市搬進郊區的學者或作家變成了獨立寫作者，爲了商業利益或升等／教職而寫。縱然是分析社會議題，目的也不是批判，而是從中賺取個人名利。

雅各比毋寧在提醒我們，獨立知識分子消逝於高等教育的膨脹後。大學教職與學院場域以優渥的人生收編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教授不等於知識分子，甚至教授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只是專門研究某一領域的研究人員，這些人追求的是同儕的認可與學術論文的發表，汲汲營營於職位、薪水，遠勝過於對公眾議題的關心，發表越來越遠離社會大眾／教養階級的艱澀論文，以學術專業自成一場域球員兼裁判自絕於社會之外。

雅各比說，獨立知識分子的角色看似被社會學家繼承了，但這些學者卻不是公共型知識分子，而且就算評論時政，也不再激進，毫無熱情，只有學術專業。雅各比說，社會學者再沒有一個人能擁有像C. W. Mills般的批判火力與社會影響力。

此外，若真有人膽敢冒大不諱想突破此禁忌，例如美國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致力於批判美國政權之不公義，就會被相關的學者以不夠專業爲名大肆指責、嘲諷，剝奪其批判的權利，將其擠回學術專業領域裡。

以《最後的知識分子》來檢視臺灣的狀況，臺灣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戒嚴了38年），社會解放也晚，但是，促成社會改革的力量，曾經就是來自學院裡的教授學者，例如當年推動刑法一百條的廢除，上街頭抗議，推動社會運動，乃至於野百合學生運動的催生，許多無聲的力量，都來自校園，來自學子。對臺灣來說，曾經擁有燦爛的知識分子良心的，更多是正在校園裡讀書，擁有滿腔熱血的青年學子。


只不過，臺灣那些曾經奮起的聲音，曾經不爲權勢的發言和運動，卻也隨著臺灣社會的商業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不少獨立的聲音在出國深造後回臺之後，一如雅各比所說的，被學院收編，而原本推動改革的學者教授們，則隨著政黨的轉移而嚐到了權力的滋味。換了位子，腦袋似乎也換了。政黨輪替讓原本的知識分子良心有機會掌握權力，結果卻是這個社會再沒有秉持獨立知識分子的良心發聲的人。

至於每天在電視上高談闊論的名嘴們，當然不是知識分子，這些人受制於節目通告與收視率，總以討好特定閱聽族群的言論爲主。別說批判，連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沒有。

面對本書唱衰知識分子，其實也無需感到太憂心。這本寫於1987年的學術研究，開啓了世人對「知識分子」研究的關心，日後有許許多多人開始反省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也寫出了



不少深刻的批判性作品，像《社會健忘症》（*Social Amnesia*）、《失敗的辯證》（*Dialectic of Defeat*）、《烏托邦的終結》等，逐漸影響了學院生活的改造與社會大眾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的關切。

網路的崛起，更是一舉打破了各種勢力疆界，人人都可發言，雖然言論水準高低有別，但是，學院顯然無法完全收編有志於獨立思考的聲音，更難能可貴的是，許多人根本不在意所寫之文字能否換得名利，只是默默的在自己所關心的社會議題上耕耘、努力。也許，網路的無疆界和多元去中心特質，可以形成新的公共關懷形式，不受商業或政治勢力的控制，重新讓知識的批判力道回流社會，培育出新一代的公共型知識分子，與社會 / 公眾對話，再度成為啓蒙公眾與引領社會發展的先驅者。

更正啓事

本刊第113期（民國97年5月）刊載《柏楊著作目錄》，頁27文末編例：四、本目錄參考來源包括：柏楊大事記（「柏楊文物館」網站：<http://boyang.nutn.edu.tw/archieve/boyang/index.html>，國立臺南大學），誤植為臺南成功大學，特此更正。在此謹向「國立臺南大學」及讀者致歉。